

“真实”的谎言

——从《抹除》看美国族裔文学的困境^{*}

陈 广 兴

内容提要 当代非裔美国作家埃弗雷特的长篇小说《抹除》探讨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新近面临的困境。小说表明，过分强调作家的族裔身份和作品的关系，把作品看作表达族裔身份的工具，既不利于少数族裔追求自由平等的斗争，也不利于少数族裔文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珀西瓦尔·埃弗雷特 《抹除》 黑人文学 少数族裔 真实性

珀西瓦尔·埃弗雷特（Percival Everett 1956—）是当今非裔美国作家中的佼佼者，已有 14 部长篇小说问世，曾获笔会小说奖、美国艺术文学院奖等多项大奖。对一位有着非裔背景的作家，评论界一般会把他放入少数族裔的行列，并以这种身份背景为基点，对他的著作展开评论。但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何为 race（种族）时，埃弗雷特却说：“race 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狗、马、或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远处的某个地点。”很显然，埃弗雷特不喜欢别人把他和种族联系在一起看，因此，他故意岔开，无厘头地去解释 race 的另一个意思“赛跑”，以表达他的不以为然。^② 当采访记者金凯德又问他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黑人作家”时，他说：“我是一个黑人作家，就像你是一个白人教授、那边的家伙是个肥仔银行家一样。”^③ 从这种表述可以看到，埃弗雷特拒绝简单化的

^{*}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KX18105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11YYCGX01）阶段性成果。

^② Jim Kitchard “An Interview with Percival Everett” in Callaloo (Spring 2005) 377.

^③ Jim Kitchard “An Interview with Percival Everett” 377.

“黑人作家”标签，反对在自己的种族身份和作家职业间划上等号。他的这种思想，可以从他200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抹除》(Erasure)中窥及大概。

长篇小说《抹除》集中探讨了种族身份和作家职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的小说主人公埃里森，绰号“蒙克”，是一个先锋派作家。他解构后结构主义的小说屡遭拒稿，理由是“缺乏黑人特色”。他为此深受伤害。更令他无法容忍的是，一个黑人女作家充满种族主义倾向的小说《我们在贫民窟的生活》却红极一时，被评论界认为“真正反映了黑人生活”。愤愤不平的蒙克化名写了一部小说《操》(Fuck)，用戏仿手法对所谓的黑人小说进行了批判，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不料，文学界却如获至宝，把反话当成了正说，称它是“美国黑人最新的声音”，后来此书竟然还获得了全国图书奖，并且高价卖出了电影版权。在《抹除》中可以读到《操》的全文。小说《抹除》出版后，在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埃弗雷特迄今最优秀的作品。《出版家周刊》更是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就足以使他同赖特和埃里森并驾齐驱。^①200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将其评为该年度值得关注的作品。《抹除》不仅揭示了美国族裔文学在今天受到不寻常关注背后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心理畸态，也透露出一种全球性的、隐藏在对处于边缘、弱勢的族裔貌似平等尊重的高抬贵手背后的大国心态和强势解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抹除》所揭示的少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文学的困境。

—

根据美国以往的蓄奴法，一个人的身份取决于母亲。母亲是奴隶，孩子也是奴隶；母亲是自由人，孩子也是自由人。1806年，一个叫汉娜·莱特的女奴向弗吉尼亚法院起诉，声称自己是女印第安人的后裔，要求得到自由身份。根据弗吉尼亚的法律，白人和印第安人天生自由，而黑人天生是奴隶。为了确定汉娜是黑人还是印第安人，审理此案的塔科法官求助于生物学特征对她进行了种族鉴定：“非洲人及其后裔，在肤色的辨别特征消失或难以分辨之后，其面目特征依然清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天然特征有二：扁平的鼻子和卷曲的头发。而后者持续的时间更长；由于后者是非洲人外貌上非常重要的特征，因此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出身。”^②法庭最后由此作出判决：“所有证据显示，汉娜的头发是本国

① Review of Erasure in Publishers Weekly (August 13, 2001) 283

② Ian F. Haney Lopez,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964

土著居民的长、直、黑的头发”，因此汉娜“绝对是自由人”。^①一个女人就这样依仗头发的特征摆脱了奴隶的命运。

种族的生物学决定论遭到了现代基因科学的否认。现代科学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基因，所有的黑人都拥有，而非黑人没有；同样，也没有所有白人拥有、而非白人没有的基因。^②实际上，通常被称为黑人或白人各自内部的基因差异，甚至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都更大。^③种族并非生物学事实，而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在今天，这已几成学界共识。^④然而，尽管这种坚持种族身份和差异自然天成的假设受到重重挑战，把种族看作天生特征的观点一直阴魂不散。在现实中，身体常常是我们生活中指示种族身份和种族差异的工具。肤色、发质、面部特征一直被用来指示一个人的种族归属。弗朗兹·法农强调了身体在种族化过程和体验中的重要性。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造了一个词语“epidermalization”（表皮化），用以描述殖民主义者对黑色的建构“像颜料”一样写进了他的身体，把他“固定”为与白人相对的他者。^⑤黑人的皮肤带来的种族属性成了一个事实，时刻左右着黑人的生活。

在《抹除》中，根据其面部特征，主流白人社会把主人公蒙克定义为黑人。但蒙克质疑这种模式化的种族分类。他承认自己有黑褐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扁平的鼻子，而且祖先中有些是奴隶，“因此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告诉我，我是黑人。”^⑥然而，他酷爱马勒，以最优异的成就毕业于哈佛大学，精通数学，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祖父、父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大夫。这些都与黑人的刻板形象格格不入。而且他既不会打篮球，也不会跳街舞，更不是在内城区或南方农村长大，迥异于以往的经典黑人形象，连他的黑人朋友都认为他“不够黑”。（2）其实，无论说他是黑人，还是说他不够黑，其实并无不同，都是从本质论的立场出发，按照一种偏颇而僵化的标准，对一个人进行定义。而这一标准既包含经证明是错误的生物学标准，也包含一成不变的社会学标准。

黑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从表面来看，白人社会根据其肤色、发质和鼻形，把蒙克定义为黑人，这似乎是奉行客观原则。但实际上，黑人是一

① Jan F. Haney Lopez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965

② Alan A. J. J. J. John Cronin “Fact, Fable and Myth on Human Evolution”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520 (1988) 29

③ L. L. Cavalli-Sforza “The Genetics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80 (Sept. 1974) 231

④ Michael Omi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⑤ Fran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Reissue edition, 1991) 109

⑥ Percival Everett, *Erasure* (New York: Hyperion, 2001) 1. 以下引用该小说时页码随文注出。

种被白人创造出来的身份，这种身份携带着一整套对黑人的描述，蕴含着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于是有关黑人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黑人即通过此框架进入主流社会的意识之中。因此，黑人身份总是建立在外在性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是白人对黑人进行描述，使黑人说话，展现他们的贫穷、懒惰、暴力、色情和愚钝。因此，黑人身份这一外在性的产物当然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表述。

因此，黑人必须展示自己的“黑”，才能为人所关注。但怎样才算黑呢？首先，生物学特征必须明显，即皮肤必须够黑。在《抹除》中，有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分别出现在蒙克创作的两篇小说中。一是在《操》中，主人公凡·勾到电视台参加一个非常流行的谈话节目，化妆师在他的脸上涂满了凡士林。凡·勾问：“涂这垃圾干嘛？”化妆师回答说：“这会让你油光锃亮，就像电视上地道的黑鬼。”（112）另一个短篇小说讲述汤姆参加电视有奖竞猜，化妆师把他的脸涂成了褐色，汤姆问：“涂这个干嘛？”化妆师回答说：“你不够黑，亲爱的。”（173）观众需要他们是“地道”的黑鬼，因此，为了将凡·勾和汤姆转化成为代表整个黑人群体的符号，必须通过人为手段，让不够黑的黑人变得够黑。

其次，黑人必须能够证实白人心目中刻板的黑人形象。在这两个电视节目中，前者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黑人道德上的堕落，而后者则是为了体现黑人智力上的缺陷。汤姆的对手是一个白人，电视节目主持人为了让白人赢，总是让汤姆回答诸如“细胞分裂后期”等专业性极强的问题，而让白人回答诸如“美国第一任总统是谁？”、“雄性的鸡叫什么？”等异常弱智的问题。人们观看的不是他们鲜活的、具体的现实生活，而是凝固的、抽象的对黑人的表述。这种表述往往一成不变，并且忽视个体差异。蒙克在街上遇一乞丐，把自己刚买的甜瓜送给他，乞丐惊慌失措，仓皇遁去。其原因显而易见，主流文化对黑人的定义当然包括“暴力倾向”，而蒙克的被想象出来的暴力让乞丐落荒而逃。

在经典的白人文学作品中，黑人无法表述自己，只有白人能够表述黑人。正如《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所说，“假若史乘由女子编述，像教士们保藏在经堂里的那么多，她们所写的男子的罪恶，恐怕所有亚当的子孙，都还偿不清呢。”^①在历史上，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黑人自己无法言说，只能被掌握着话语权的白人言说。力量模式影响着言说黑人的话语模式。而今蓄奴

^① 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制早已成为历史，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白人无法肆无忌惮地言说黑人，白人文化只能让黑人言说自身。然而这种言说并不是黑人在自立状态下的言说，黑人只能按照主流文化的意愿表述自己。同过去一样，权力关系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上述两个情形中，电视台完全控制在白人文化之下，黑人只有按照电视台的意愿，才能有权说话。而黑人作家所面临的境遇与此相差无几。

在与出版社和电影公司的两次谈话中，蒙克必须歪曲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符合“黑人”的标准。蒙克与编辑鲍拉通电话，蒙克纯正的英语和文雅的措辞让鲍拉很失望，“完全不是她所期待的情形”。（156）蒙克只好改变策略，粗鲁地打断她的话，不留情面地拒绝回答她的问题，装出一副对白人恨之入骨的模样。这一招非常顶用：“如果我当时在她的办公室，她肯定会脱掉衣服，从桌子下面朝我爬过来，即使不是实际上的，至少也是精神上的。”（157）蒙克与好莱坞电影制片人摩根斯坦的谈话与此大同小异。摩根斯坦对蒙克的形象也是大失所望，因为眼前的蒙克远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粗野”、“粗俗”、“足够黑”的标准。（217）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蒙克语气冰冷地打断摩根斯坦的话，毫不客气地质问他见面的动机，不动声色地称自己因杀人而坐过牢，在对方索要电话号码时，更是大笑一声，扬长而去。蒙克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冷血黑人杀手，使得摩根斯坦既害怕又喜欢，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地道的黑人”。（222）埃弗雷特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作家不是问题所在，出版商才是问题所在。”^①面对决定作家成败的出版商和制片人时，蒙克只能把自己塑造成白人心目中刻板的黑人形象，而这一切都以牺牲他的本来面目为代价。为了生存，黑人作家不仅要重新定义个人的外部形象，而且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创作理念。

二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黑人是否是人类的讨论。黑色成为“一种缺席的象征”，指的是一群缺乏文明人类必要素质的人。对启蒙思想家来说，读写能力是定义人的文明素质的主要标准。因此，早期黑人作品被那些反对主流观点的白人用来证明黑人不是物体，而是具有智力、能够像白人一样具有思想和感情的人类。如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盖茨指出：“同其他文学传统不同，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在 18、19 世纪得以产生，是为了驳斥那些认为非洲后裔没有、也不会有文学创作的言

^① Jim Kneidel “An Interview with Percival Everett” 380

论。”^① 因此，黑人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粹的文学被人审视，而是充当证明“黑人具有‘文化’潜力”的证据。^② 例如早期黑人作家菲莉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 1753—1784）和伊格内修斯·桑乔（Ignatius Sancho 约 1729—1780）作品的结构和风格上的优点被当时的人们共同忽视，他们的文本普遍被那些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士用来证明非洲裔具有进入人类大家庭的潜力。

用黑人作品证明黑人完全有资格称为人类，能够像白人一样具有文字能力，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显然崇高且必要。这些努力构成了非裔美国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确立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看待黑人文学的严格的社会学的、实用性的倾向。黑人作品中，信息至高无上；形式仅仅成为一种手段。盖茨在《黑皮肤的人：语言、符号和种族的自我》前言中说，讨论黑人文学的绝大部分学术著作仅仅关注黑人文学的原素材，几乎完全在社会学或政治的意义上研究黑人文学，就好像黑人文学的唯一价值就是它所传达的关于“黑人经验”的信息，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的形式、风格或结构。^③

用托尼·莫里森的话说，“文学的黑人性”一直是作为白人美国文学的对立面、作为反动的客体而存在的。^④ 她认为，美国文学一贯拒绝承认黑人文学的存在，一贯把黑人当作指代混乱和罪恶的便捷工具。^⑤ 而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在“平等权利法案”和大众“政治正确”意识的推动下，黑人文学与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同性恋文学一样，从边缘进入中心。^⑥ 然而，虽然非裔文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它却随着这种重视陷入另外一个困境：他们只能讲述自己民族的所谓“真实”故事。老式种族主义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控制虽然已经不再可能，但白人文化自诩为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感却并没有消失，只不过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体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白人不再自说自话，他们以一种貌似宽容的态度鼓励黑人踊跃发言。然而黑人作家要想真正获得主流文化的欢迎和褒扬，只能充当一个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讲述自己种族的所谓“真实”故事，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提供佐证。

这就是《抹除》主人公蒙克所面临的写作环境。编辑对其作品如此评价：

① Henry Louis Gates Jr,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New York: OUP, 1987) 25

② Henry Louis Gates Jr,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4

③ Henry Louis Gates Jr,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xxviii

④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xii

⑤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7

⑥ Zhu Gang, *Preface to Bernard W. Bell: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

“小说结构得当，人物丰满，语言丰富，情节微妙高超，但我们就是搞不懂，重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有何关联。”（2）人们关心的不是黑人作家的艺术造诣，而是他所能提供的“黑人信息”。蒙克之前几乎从未考虑过种族问题：“我不相信种族。”（3）而且他的创作“既非为某种说法提供证据，也非宣泄社会愤怒，更非缘于家庭的口述故事传统”：“我从未试图解放某人，从未试图描绘‘我的’民族的真正生活图景，而且任何人的生活图景我都不熟悉，还不足以对其进行描绘。”（213）“种族平等”、“少数族裔的苦难”、“少数族裔的诉说”、“少数族裔的抗争”等概念，其本来意图是为了争取弱势群体的平等地位，但它们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却蜕变成新的宏大叙事，它们要求少数族裔作家牺牲自己的个性，变成这些概念的传声筒。

在这些新的宏大叙事的作用下，少数族裔作家受到空前的压力。无论是经纪人，还是编辑，都希望蒙克能够讲述“真正的”黑人故事，而彻底放弃“重述埃斯库罗斯，戏仿法国后结构主义”。（2）蒙克同时也受到来自书店的压力，书店总是把他的作品放置在黑人作家一栏，而他的作品其实与黑人没有任何瓜葛，因而无人问津。普通读者宁愿去读哗众取宠的《我们在贫民窟的生活》，而不去买他精心撰写的后现代小说，甚至连他姐姐也不例外。

为了发泄愤懑，蒙克创作了一部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黑”的小说：《操》。小说模仿所谓的粗俗不堪的黑人口语，拼写和语法毫无规范；小说人物贫困潦倒，教育低下，缺乏最起码的道德原则，且性欲旺盛，具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小说突出“少数族裔的社会控诉”主题，认为全社会都应该为凡·勾的堕落负责。蒙克把所谓的“黑人小说元素”推向极致，本想借此揭露这种做法的虚假和种族主义倾向，不料人们却把它捧上了神坛。出版社认为《操》“忠实于生活”，“非常诚实”；（136）电影制片说它“再真实不过了”；（217）电视主持认为它“绝对是最真实的作品”；（251）评论家则认为它“是一部真实、地道而富有勇气的作品”，“其中普通黑人的力量与野蛮令人耳目一新”。（254）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真实”。

蒙克出身中产阶级，但他不能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他必须描写上面说到的那种所谓“真实、地道”的黑人，不然就不够“黑”。蒙克的编辑所界定的真正的“黑人性”，根据莫里森的观点，是业已死去的、19世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作

家所界定的黑人性。^① 小说以凡·勾梦中杀母开篇。通过弑母，这位主人公体现出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黑人”特征：充满暴力、性欲强烈、父亲缺场、幼稚无知、亲情缺失。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叙事声音，都表达出一种莫里森所批判的“黑人性”：“黑人的语言总是被建构为一种异族的、陌生的方言，通过拼写，故意变得难以辨认”，白人通过刻意使用这种语言，强化了白人的话语权和黑人的失语之间的张力，“强化了阶级差异和他者性，并彰显白人的特权和力量。”^② 凡·勾总是使用重复性的、毫无逻辑联系的语言，这强化了凡·勾作为一个非理性的“动物”的形象。所谓的黑人文学的真实性，其实就是白人经典文学中早已存在的模式。黑人作家所具有的“他者性”要求他们继续强化这种虚构。

蒙克叙事中提到评论界对《我们在贫民窟的生活》的反应，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强迫的真实性的运作模式：她“创作了一部非裔美国文学代表作。我们几乎可以听见她的人物在说话。……小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作品真正的力量在于它令人着迷的逼真性。贫民窟的描述怪异绝伦，令人流连忘返，掠夺者肆虐横行，无辜者任人宰割”。（39—40）这篇评论称这部小说是“非裔美国文学代表作”，其理由是小说的“真实性”、“逼真性”，以及它与黑人生活模式的相像。很显然，这部小说之所以被高度评价，是因为它证实了关于黑人生活的僵化描述。贫民窟“怪异绝伦，令人流连忘返”，很显然是一片值得玩味的蛮荒之地。

黑人作家只能表达“黑人体验”，作者的族裔身份决定了他能写什么，文学性追求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这种所谓的真实性往往携带着猎奇心态。格雷厄姆·哈根把猎奇看作对文化差异进行“商品化”的一个方面：“奇异性（exotic）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特定人群、物体或地点固有的特征；猎奇（exoticism）是一种美学接受方式，它使人、物体、地方变得奇特。”^③ 少数族裔的作品往往被赋予哈根所谓的“人类学的奇异性”，因而被看作“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直接表述”。^④ 《抹除》中有一批评家说，《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校必读作品。它并不是因为文学价值得以出版，而是作为对黑人生活的“真实”呈现而出版，可以作为口头的自传人类学素材进行阅读和研究。

①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67.

②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52.

③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13.

④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53.

三

盖茨在《种族的未来》中讲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耶鲁大学的“纸袋晚会”，即门上挂一褐色纸袋，肤色深于袋者不得入内。他说：“我们坚信，这是一种应该即刻终止的文化遗产。但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遗产被一种相反的检测所代替：意识形态上‘不够黑’的黑人则不受欢迎。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是一种进步。”^① 现今的少数族裔作家，必须标榜自己的种族身份，讲述自己种族的“真实”故事，才能在图书市场上立足。

蒙克的命运，其实是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共同宿命。著名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奇 (Louise Erdrich 1954-) 对此也心怀警惕，在代表作《爱药》(1985) 中，她通过各种方式避免被定义为印第安作家而遭“奇异化”(exoticize)^②。华裔作家汤亭亭曾多次表示，她写的是美国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东方世界文化学与人类学的资料。她希望美国文坛能够将她视为一名独立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她的作品。因为在西方“没有谁期望约翰·斯坦贝克或赫尔曼·麦尔维尔去表现所有白种美国人”。^③

对少数族裔文学真实性的要求，就其本质而言，是白人中心主义在作祟。这里所谓的“真实表达”总是以少数族裔的他者地位为前提。正如桑契兹-阿斯所言，“真实性同他者一样，都是建构的结果，两者都遵循同样的过程，而且通常是其他民族和他们的故事因真实性而受到褒扬。”^④ 在对少数族裔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中，他者性被文本化，他者言说的方式被严格规定。讲述被规定的真实性，是少数族裔作家难以摆脱的命运。

为了生存，少数族裔作家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屈服于这种对真实性的要求，充当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导致了非常不利于少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文学的后果。首先，过分强调少数族裔作品的“真实性”，不利于少数族裔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一方面，对少数族裔作品“真实性”的要求，基于一种身份政治学，即特定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相同的特征。建立在这种

①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Cornel West, *The Future of the R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6) 18-19.

② Lydia A. Schullz, "Fragments and Ojibwe Stories: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in *College Literature* (Oct 91, Vol 18, Issue 3).

③ 转引自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473页。

④ Ana María Sánchez-Arcé, "'Authenticity' or the Authenticity of Authenticity" in *Mosaic* 40/3 (September 2007) 141.

观点之上的批评，把小说看作现实，把身份看作自我的本质特征，并且只能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得到表达，从而强化了在对待少数族裔主体性时的本质主义倾向。真实性一旦成为“一种强加的命运”，就会沦为“保守主义和社会压迫的工具”。^① 加雷思·格里菲斯就表明了真实性与殖民主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言语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对真实性的过分推崇，本身是一种建构，它解除了弱势群体最有力的武器。”^② 另一方面，反过来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贫民窟小说也被那些受害者阅读。蒙克虽然对黑人作家的边缘化甚感愤怒，但普通的黑人却喜欢这些作品。这是因为“真实性”的评价标准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不知不觉中也塑造了黑人的阅读习惯。本来弱势群体被强行划归一类，但他们自己对这类作品的认同和阅读，无疑加深了这种虚构的联系，并使得黑人性的僵化形象得到强化。

其次，对少数族裔作品真实性的过分强调，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害。读者和批评家通过两种方式逼迫作者就范，阻止他们跨越约定的特征：要么忽略不符合他们的定义的内容，要么强行在作品和他们的定义之间建立联系。因此，读者就会要求作者创作符合其心目中真实性原则的作品。对“真实性”的强调虽然允许并赞美差异，但同时又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话语限制这些差异的表达。这种“令人难以解脱的强加的命运”在服从商业利益的同时，扼杀了作家的创造性，限制了作家对主题和风格进行选择的能力，使他们的作品丧失了丰富性和活力。同样，阅读过程也成为机械的过程，读者在寻找业已被认为真实而有意义的特征。根据亚类（如非裔美国文学、妇女文学）而不是根据体裁和风格对图书进行分类，使文学丧失了至关重要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助长了根据真实性进行批评的倾向，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品则无人问津。

美国华裔文学也未能幸免真实性的危害。就拿哈金来说，他是当代最为美国文学界接受的一位具有中国背景的作家，然而他“在美国的畅销，是美国图书界把他的作品当作一种真实的社会反映而不是虚构作品推销的结果”。^③ 哈金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很乖觉地给自己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关照。他笔下的中国人很难让读者喜欢，坏人永远是坏人，主人公永远是窝囊废，女性人物永远是面目模糊的表意符号。甚至他唯一以美国为背景的《自由生活》（A Free Life 2007）着意揭露的却是中国的弊端和中国人的劣根性。

① Yael Tan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93) 50

② Gareth Griffiths “The Myth of Authenticity” in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241

③ 陈广兴：“自由的写作？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悖论”，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第85页。

在他的所有小说中，随处可见迎合“真实性”要求的元素，例如“文革”、专制、小脚、强暴、受挫折的人生等。

其实整个西方世界的华裔文学都难逃“真实性”的怪圈。以2008年发表的一些华裔作品为例，曾以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①先后赢得爱尔兰的奥康纳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等奖项的李翊云，2008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者》^②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前前后后的事情。美籍华裔女作家徐军2008年推出短篇小说集《即将致歉》^③，也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为了在西方文学市场分得一杯羹，华裔作家往往不遗余力地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而“文革”和历史上一一些政治事件一直都是华裔作家吸引西方眼球的拿手招数。我们希望随着西方对中国的逐步了解、猎奇心理的逐渐散去，华裔作家能够一改信息提供者的身份，以文学成就赢得世界的认可。

这种“真实性”困境不仅存在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文学中，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全球政治关系和文学关系中。甚至诺贝尔文学奖也一再屈服于这种压力。当前学术界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把作家作品与其出身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作品看作作家表达族裔身份的工具，而不是独立存在的艺术品。^④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评论。她警告，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听众、具有霸权的人群”，会把一些人看作特定群体的代表，从而对他们提出真实性的要求。^⑤《抹除》告诉我们，在这种话语霸权的压迫下，“真实”其实成了谎言。

[作者简介] 陈广兴，1975年生，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最近发表文章有《身体的变形与戏仿：论菲利普·罗斯的〈乳房〉》（《国外文学》2009年第2期）、《论文学中的巧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Y Yun Li,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② Y Yun Li, *The Vagant: A Nov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③ Xujun Eberlein, *Apologies For Homecoming* (Arlington: Livingston Press) 2008

④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London: Oxford UP) 1972) 93

⑤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60